

# 孔憲鐸

- 園藝系畢業(1958畢)
- 香港科技大學 榮休教授、生物系兼任教授
- 美國馬里蘭大學 榮休教授

## 簡要事蹟



- 1968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學位
- 1981-1999 晉升為正教授並兼代系主任、副院長、創辦農業生物工程中心主任、副校長
- 1991應聘為香港科技大學任首席副校長
- 2001退休並被聘任為榮休教授和兼任教授

孔教授從事植物分子生物學以及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逾廿年，出中英文學術參考書籍十餘冊，故多次獲學術論文獎及文藝獎，又時常應邀出席國際會議，被列入十八種國際和美國名人錄。

## 訪談紀錄

**問：**您在進入母校之前的求學過程很曲折，也很感人，請您敘述供我們的年輕人勵志參考。

**答：**是的，我在未讀大學之前，由於戰亂連年，未得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，斷斷續續的連私塾加小學一共讀了大約二年左右，其餘的知識全靠在逃難和做工謀生之外自修而獲。我出生在抗日戰爭的前兩年〈一九三五〉，又生長在整個抗戰八年和整個內戰的期間，更不幸的是我出生在烽火連年的地區——山東省南部的臨沂地區。魯南地區，是在抗戰初期的台兒莊大戰，和內戰末期的徐蚌會戰時兵力聚集之地，也就成了兵家必爭之地。我的家鄉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，可以說是連年烽火，民不聊生。因此，我的童年，從兩歲到十四歲，都是在戰亂中逃難渡過，哪裡有讀書的機會。從年齡上而言，我是十歲那年〈一九四五〉，跟父兄離開家鄉，逃難到蘇北的宿遷縣，同年又遠逃至上

海，以學徒為生。十三歲離開父母，隨同年長的同學和師長逃到安徽蕪湖，成了“流亡學生”。在那半年多的“流亡學生”歲月中，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，哪有上課的機會。

一九五〇年偷渡到香港，那年我才十五歲，初到香港時，人生地不熟又身無分文，睡過馬路，後來到香港紗廠做小工。在紗廠做工人的四年歲月裡，省吃儉用，在工作之餘去一私人補習班上課，憑著自己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努力，有幸能在一九五四年考取台中農學院〈中興大學前身〉，並在九月底離港赴台升學。在香港紗廠做小工的日子裡，深受失學之苦，因而分秒必爭的把握時間，時時刻刻的在自學、苦學的充實自己，在自我鼓勵和自我鞭策下，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。總算老天不負苦心人，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穫。我之能夠有今天，靠的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，是那份不折不扣的“努力”和“自信”，我這一番努力奮鬥的經過，在十年前寫成一本書，書名為“背水一戰”〈香港、北京三聯書店出版〉，頗受青年們的歡迎，也頗能為勵志增添一份力量，這是我未曾預料的一份收穫，以前，總以為出身微賤，不足掛齒，所以從未提及。我用“背水一戰”作為自傳書名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。在我這一生的奮鬥中，幾經波折，每次能夠起死回生，都是用“背水一戰”的精神去克服的：在台灣讀大學靠的是“背水一戰”的精神，因



· (《背水一戰》新書出版發表會)

為沒有選擇的餘地；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博士學位，靠的也是“背水一戰”的精神，否則就無顏見“江東父老”；到馬里蘭大學執教，又何嘗不是靠著“背水一戰”的精神呢，那時候失去這“一村”，就很難再找到另“一店”了；一九九一年應聘去香港創辦香港科技大學，靠的也是這股“背水一戰”的精神。

我的人生經歷很曲折，也可以說是很豐富：我睡過馬路，也睡過總統套房；做過乞丐，也吃過國賓大餐；當過紗廠小工，也任過中、外大學校長；沒有中、小學學歷，也有博士學位。而且，我足跡走遍亞、美、歐、澳各大洲，以及海峽兩岸三地。由於我在大陸住過十七年、香港十七年、台灣九年、加拿大八年、美國二十年、英國一年，所以我的視野很廣、經驗很多，對每件事務的看法，總是加上另類的角度，像是多了一隻眼睛，第三隻眼睛。

我感謝我的母校——中興大學，給了我四年完整的教育，也讓我擁有了有生以來第一張畢業證書，這是在人生戰場上，能有今天的一個主要原因。沒有母校這一階段的教育，我就沒有參與人生競賽的跑道。趁此榮獲母校授與“傑出校友”的機會，我懷著感恩的心，特別在感恩節期間，回來謝謝母校賜給我的良機。

**問：**您大力推動生物工程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，是甚麼原因讓您這麼投入？

**答：**別忘了，我出生在山東的農村，是生長在農村的孩子，比較能夠深知農村的疾苦，更別忘了，我學的是園藝，是習農出身，比較起來，更知道農業的保守，單從這兩點上來說，您就可以看得出來，為甚麼我會對推動農業現代化如此投入。從目前科技的進展來說，可以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科技，要首推生物工程了，這就是我一直大力推動農業生物工程的潛因。

從更深一層的角度來說，我對“民以食為天”和“國以農為本”的體會，比生長在城市和不曾習農的諸君為深。



· (全家攝於曲阜孔林)

開門七件事“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”，除了鹽之外，都是農產品。農產品則由於人口的增多、生活習慣的改變、可耕地的減少，總有一天會變得供不應求，“吃”會變成人人天天擔心的問題，待事到臨頭，再去迎頭趕上，就已經太晚了。問題的癥結是：上述的問題大家不是不知道，但是知道並非意味著實踐。從古到今，從中到外，口口聲聲講農業重要的人多，而切切實實重視農業重要的人少。為政者如是，為民者亦復如是。世界上，尤其是亞洲的農民，眾多而純樸，辛苦而貧窮，農業更是人力密集而保守，地力老而衰退。故而，歷來為農民不平而革命的人有，為農民勞苦而獻身的人少。我一直希望能盡一己之力，為農民和農業請命。農民不能安居樂業，則一定導致社會混亂，農業不能與時並進，則立國基本必會受到威脅，因為環顧世界各國，沒有一個強盛的國家，農民是不富裕的、農業是不發達的；也沒有一個農民富裕和農業發達的國家，是不壯大的。所以，我們大家不要忘了“民以食為天”和“國以農為本”。

**問：**一九九七年，母校第一次以選舉方式普選第九任校長，經過一系列競選程序後，您在七位候選人中得最高票當選，復經教育部選聘一人為校長，結果您又是首選，教育部敦促您回國就任校長，您怎麼沒有到任呢？

**答：**直截了當的答案是：“雙重國籍的問題”使我沒有到任。當時這件事引起了台灣教育當局和學界的共同關注，並謀求解決之道。多年來幾經多方努力，現在“雙重國籍”已經不是問題了。我當時對放棄美國國籍的後遺症的了解不

夠，我平時風聞到的和最終從律師那裡得到的實際情況，有著很大的差異，而且比事前想的嚴重得多，將使我在母校校長任滿退休後無法承受。

謝謝您提出這個問題，給了我一個機會，向母校的師生說聲由衷的感謝，謝謝大家對我的鼓勵和支持，同時也致以深深的歉意，沒能夠應母校之召喚回校服務。有機會回母校擔任校長，是任何一位校友最大的榮幸。九年過去了，我仍然有著揮之不去的遺憾。但是我對當年那批邀請並支持我的年輕有為、敬業有成的朋友們，仍心存感激、仍心存敬意、仍心存歉意。像他們那樣力求改革、愛校如家和捨己為群的精神，在兩岸三地、美國或加拿大我所熟悉的校園中，實不多見。中興大學就是因為有了他們這批傑出人才，才有今天蒸蒸日上的氣勢，才有不可限量的前景。

**問：**學長的學術貢獻很大，著述甚多，曾在“科學”和“自然”雜誌上發表論文多篇，後來從事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，而且很快的就擔任要職。在美國是不是也會“學而優則仕”？能不能簡述一下其中的過程？

**答：**是，至少在我個人的經驗上是如此的。我發表的學術論文有一百二十多篇，編著的英文專業參考書籍十四種，出版的中文著作近十冊，加上發表在報刊、雜誌上的文章數十篇，著述算是豐富。後來在馬里蘭大學的系、院和校級擔任行政管理工作，是和我的學術地位有著密切的關係，這也許就是世人所謂的“學而優則仕”吧！在校園裡擔任學

術行政工作，最重要的條件之一，就是能在學術上站得住腳。

由於我少年失學，得到博士學位時，已經三十三歲，又做了六年的博士後，所以當我在一九七四年獲任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職位時，已年近四十。不過，我在工作上及時追補以前失去的歲月，因而在事業的進展速度上不慢，兩年多後，就晉升為副教授，再四年後又晉升為正教授。接著就在一九八二年，當選為系主任，兩年後升為文理學院學術副院長。一九八七年受命創建一個專為生物工程而設置的新興校區，並主持建立農業生物工程中心，兼任該中心主任，一九八九年，又受聘為這所新校區的代理學術副校長。二十年後的今天，上述的中心和新校區，已在馬里蘭大學的系統中，佔有顯著的重要地位，我為之驕傲。馬里蘭大學並禮聘我為終身榮休教授。

一九九一年，前往香港參與創建香港科技大學工作，當年開學招收新生七百人，次年我被升任學術副校長，在任七年。一九九八至二〇〇一年任生物系教授，退休後〈二〇〇一〉被禮聘為香港科技大學終身榮休教授並受聘為理學院兼任教授至今。

如眾所週知，香港科技大學在創校僅僅十年之後，就振翅高飛，成為世界級的一流大學。今年英國泰晤士報所列全球一百間大學的排名中，香港科大名列第五十八，其他擠進“泰晤士百大”的亞洲大學也不過十所，香港科大的成就令人振奮，令我自豪。🇧🇪

(採訪者戴子仙校友，加拿大安省中興大學校友會會長)

